

港安老服務 可有明天?



其實5,000元已經足夠聘請一個家庭傭工了，假如長者居所是允許的，為甚麼不容許他們這樣做呢？

周曼利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



香

港人口老化問題是眾所周知的。

根據統計處最新的預測，65歲的長者會由2011年佔本港人口的13%，大增至2041年的30%。長者除了因病需要醫療服務外，最大的需求便是因體弱或老年腦退化症而需要的長期照顧服務。香港的長期照顧服務長久以來面對的種種困難，都沒有受到正視，以致長者仍然未能老有所依。

長遠服務需求 欠實質數據

特首梁先生在施政報告宣布為了加強社區照顧服務，決定推行名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這項計劃其實是嘗試落實討論多時「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讓合資格的長者因應個人需要，使用服務券選擇合適的服務。

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計劃會在今年九月以試點形式推出，目的是測試財政模式是否能運作暢順，預計首批受惠長者有1,200名，來自八區。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亦說明會增加以傳統資助模式提供的日間護理中心及單位的服務時間。最後亦會透過向私營院舍買位及興建新的院舍以增加院舍宿位。筆者認為施政報告、勞工及福利局及社署都沒有正視本港長期照顧服務的問題，的確令人失望。

第一：政府對長者的長期照顧服務並沒有長遠的規劃。究竟在未來30年香港有幾多長者需要長期照顧服務呢？有多少長者需要社區照顧服務？又有多少需要院舍服務呢？

筆者知道港大學者曾經研究有關問題，他們預測長期照顧服務的開支將由2004年佔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上升至2036年的3.0%。不過他們並沒有最關鍵的追蹤研究的數據用以推算，所以預測的準確程度有待商榷。據筆者所知，香港確實缺乏這些重要數據去推算長期照顧服務的需求，但政府卻忽視這個問題，以致亦無從有長遠的計劃。

評估護理範圍 標準已過時

第二：現在假如長者要使用政府資助的院舍或家居照顧服務的話，首先便要通過一個「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根據長者多方面的情况(例如他們應付日常生活方面的能力、身體機能、記憶力、溝通能力、行為情緒、健康問題、家居安全，以及照顧者支援是否足夠等)，來評定他們的長期護理需要。

其實這套評估工具是參考一套國際間認可的「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工具而製成的。這套評估機制自2000年開始採用，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國際間認可的「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工具已經有更新版本，但香港仍然沿用舊有的工具，不能與時並



筆者認為本港缺乏推算長者長期照顧服務需求的數據，但政府卻忽視這問題，以致無從有長遠計劃。

(資料圖片)

進。而且在2000年採用這評估工具時對它的有效期研究不足，以致我們並不能肯定它的評估結果對長者是最好的安排。最後這評估工具使用多年，業界都認為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可惜社署卻對改善的聲音充耳不聞，令人失望。

第三：服務提供系統僵化亦是一個弊端。因為現有院舍宿位有限，長者一旦入住院舍，便不會再次會到自己的居所居住了。換句話說，可以說一入住院舍便不會指望有日可以回家了，但是這個觀念是不正確的。

一些服務質素高的外國院舍是可以充分發揮入住長者的潛能，以致他們經過一段時間療養後，是可以適合回家但轉變為接受家居服務的。如果可以做到這樣，長者抗拒入住院舍的心態亦會有所轉變，而服務提供者亦可以作為優質服務的指標。香港是有需要在這方面向外國學習的。

拒私人市場於門外 長者欠選擇

第四：現在長期照顧服務主要是靠政府和長者或其家人支付，隨着人口老化，政府是否可以繼續承擔這方面的開支呢？其他國家有長期照顧服務的保險融資制度，在香港是否可行呢？聽說政府有意在落實醫療保險措施後，便會開展長期照顧服務保險的討論。是否屬實，拭目以待。

第五：今次政府推行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亦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1,200名受惠長者分布全港八個區，即平均每區只有150個受惠長者。因為大多數社區照顧服務都不會有跨區服務的，所以可以想像每個區因這計劃而增加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是很少的。究竟平均每一個服務提供者可以服務的對象有幾多人呢？這樣只有現有服務提供者會可以兼顧這些新的需求長者，而不會催生一些新的服務提供者。但是服務券的好處是令服務使用者有更多的選擇權去接受服務，但現在的結果亦只是可以選擇現有的服務提供者而已了。

另一方面，在計劃的第一階段，服務券的面值劃一為每月5,000元。但是社署只會邀請非政府機構和非牟利機構(包括社會企業)作為服務提供者。這樣便拒私人市場於門外了，這個亦與服務券的原意相違背的。

其實5,000元已經足夠聘請一個家庭傭工了，假如長者居所是允許的，為甚麼不容許他們這樣做呢？香港長期照顧服務實在有很多不足之處有待政府正視和改善。何

供過於求 大學生薪低

有說高等教育普及率低會影響社會流動，阻礙社會發展，因此高中畢業生入大學率只有18%的香港應與英、美、台灣等地看齊，大幅增加大學學額。然而，大學生多了，年輕人是否一定多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早前台灣《聯合報》報道，一名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生應徵法務助理，僱主只肯開出22000元新台幣(約5777元港幣)的月薪，且不設加班費，讓他有「被羞辱的感覺」。即使考上律師，也只加薪3000，他無奈地表示：「這是目前最常聽到的薪資」。

香港教育學院署理副校長(研究與發展)莫家豪早前在台北地區進行網絡問卷抽樣調查，抽取各所高校共67系413人，發現只有5.6%受訪者滿意「近年台灣政府為年輕人創造向上流動機會和途徑的努力」，非常不滿和比較不滿者達53.2%。被問及「當今台灣社會為大學生提供的多元化的發展機會是否足夠」，認為「一般」有32%，「較少」達28.9%，「非常少」有10.1%，大多受訪者認為台灣大學生供過於求，畢業生就業艱難，收入逐年下降。

台大發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認為，台灣高等教育普及化令大學生供過於求，同時基層技術人力面臨短缺，建議加強職業教育與業界的「產學結合」，才能讓技職生在校內有更多機會接觸業界實務，同時建議重新形塑勞動價值，讓青少年知道「有一個技術比一張文憑更值得尊敬。」

大學生失業問題不只台灣獨有。近年，歐洲經濟不景，大學普及化導致大學生過剩，就業不足、薪金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等問題叢生。內地跟隨台灣等地的步伐大肆擴張大學學位，結果有大學生畢業後變成農民工。

在香港，特區政府希望發展私立大學，逐步將高等教育普及化，預期未來兩年內適齡人口組別中有三分之一青年有機會修讀學士學位課程。觀乎世界各國的例子，特區政府增加大學學位的同時，亦要積極開拓新興產業，在地產、金融之外另闢蹊徑，如發展創意工業、環保事業等，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工作機會，以免出現大量大學生失業、自貶身價、學無所用的悲劇。